

# 天主教传教士与马戛尔尼使团

袁墨香

(枣庄学院 政法与历史学系, 山东 枣庄 277160)

[摘要]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出使清朝。这是中英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国家间交往。中外学者或从中英商业角度,或从中英文化差异角度,或从中英外交关系角度,研究这次出使。本文独辟蹊径,试图从独立于中英之间的第三方——传教士的角度探讨,在马戛尔尼使华过程中,传教士是积极促进了中英双方的互相理解和交流,还是破坏了中英双方的第一次接触,从而造成中英第一次外交活动的失败?

[关键词] 传教士;马戛尔尼;中英关系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077(2006)01-0071-06

马戛尔尼使华,是18世纪中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东西方历史的一件大事。中外学者们或者从商业角度、或者从礼仪角度、或者从文化角度,写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本文拟从传教士角度,探讨在马戛尔尼使华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传教士所起的作用。

## 出使前的准备工作与传教士

1791年10月,马戛尔尼接受了英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赋予的使命,担任访华特使,着手进行使团的准备工作。使团一重要准备工作是人事安排,尤其重要的是翻译。“有一个绝对必要的,但是难于物色人选的职务,那就是中文翻译。<sup>①</sup>寻找合适的翻译,成为英使团的一个难题,并始终跟随着这次出使,即使当使团到了北京和热河,仍旧没有找到称职的翻译。

在对华贸易过程中,荷兰人雇佣能够说荷兰话的中国人做翻译。法国商船很容易找到法籍的传教士为他们做翻译。而第一艘到中国的英国商船,除了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sup>②</sup>

英商在与中国行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语言的重要性。“我们(指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痛彻地感觉出有必要学习中国语文,痛彻地体会到缺乏翻译的困难。我们尤其感到需要本国人来翻译信件和在重要的机

密会议上作口译。<sup>③</sup>所以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计划让其职员学习中文,希望不通过通事而直接由其自己人出面,同清政府交流。但是从洪仁辉北上投递诉状的事件发生以后,清廷就明令禁止外国人请中国人教授汉语。

当马戛尔尼在英国准备启程时,“在全英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而到广州再找翻译又行不通的。“少数广州本地人懂得一些葡萄牙文或英文,但他们的外文知识只能为外国商人翻译一些买卖交易的事情,任何关于其他事项的谈话,他们就难于对付了。<sup>④</sup>

为了寻找合适的翻译,副使斯当东远赴意大利,找到两名愿意回国的中国籍神父——李神父和周神父(也有一说姓卓)。他们长期远离祖国,生活在意大利,对于乾隆朝的中国实情了解无多,尽管他们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水平不错,但他们不会说英语,他们的中文水平也很一般。显然这两个中国籍神父并不能胜任使团翻译的职责,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使团到达北京后,随行的李神父,甚至不能书写一份给清廷官员的正式拜帖。

英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来华的传教士除了在语言问题上可以帮助英国人,还能够提供有利情报,从而有助于英商在华贸易。从17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与法籍传教士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些传教士经常免费搭乘

\* [收稿日期] 2005-11-20

[作者简介] 袁墨香(1976-),女,山东日照人,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教师、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研究。

英国商船往返亚欧之间。东印度公司给马夏尔尼的训令中说：“驻于北京之传教士，对于其所属之国有利与否，对于吾人有害与否，均请特为报导。”<sup>③1 P207</sup>又说：“中国政府可能不许代表国王陛下之大使或任何人驻留于北京，无论代表公司者矣。如能有法安置传教士若干于北京，为本公司利益计，担任传达消息，并有时给予吾等管货人以助力，而彼等又无任何明白之隶属关系，实为佳妙。”<sup>③1 P208</sup>明确指令，让他利用传教士打探和传递消息，安排能为英商服务的传教士于北京，帮助英商。

因此马夏尔尼的准备工作中，自然不能忘记传教士。在为乾隆选择礼物时，还特意在京的传教士选了一些欧洲制成品，以赢得他们的好感。

### 马夏尔尼使团与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

#### 一、入京前与在华传教士的接触

1793年6月19日，英使团抵达澳门。马夏尔尼遣副使斯当东去澳门，打探中国方面的消息。

在澳门，斯当东频繁与传教士接触，探听了许多消息。他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获得了一个关于澳葡的情况：葡萄牙人担心英国人获得另一贸易基地后，将会造成澳门的衰落，因此他们正阴谋反对英国使团。“葡萄牙人过去想把所有其他外国人排挤出中国的观念现在还未消减。”<sup>④1 P204</sup>当听说英使团将要来华时，在澳门的欧洲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嫉妒和忧虑。尤其是荷兰人和葡萄牙人。<sup>④4 P100</sup>澳督写给里斯本宫廷的信里说：“英国人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要求允许英国人在广东岛上定居是该使团的目的，一旦得逞，对这个邻居不可小觑，我们必须未雨绸缪。”<sup>④5 P125 ~ P129</sup>葡籍传教士出于爱国之心将会首先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

由于在欧洲，英国与葡萄牙一直是盟友，因此最初使团并未担心澳葡的态度。然而事实却与英国人想的并不同。接到斯当东的汇报，马夏尔尼对葡萄牙及在京的葡籍传教士起了戒心。

在天津，马夏尔尼接到法国传教士格拉蒙特托人从北京带来的两封密信。

格拉蒙特(1736~1812)，法国人，前耶稣会士。1785~1791年他客居广州，因此有机会与在广州贸易的英商有密切接触，对中英贸

易之间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第一封信中格拉蒙特先向马夏尔尼通报了一些英使入华之前的消息，并表示他非常欢迎英使团来华，愿意尽力为使团服务。第二封信中，他劝告马夏尔尼谨防被清廷指派为翻译的葡籍传教士索德超，称索德超已向清廷散布了一些不利于英使团的言词。从格拉蒙特的信中，马夏尔尼知道清廷为之安排做翻译的传教士的情况，这使得他入京后，在选择随行翻译时，处于一个主动地位。

英使船队到达通州，格拉蒙特再次给马夏尔尼书信，表示愿意帮助马夏尔尼，希望马夏尔尼让他加入英使团，前往热河。但他最终也未能如愿。清廷已经安排好负责迎接英使团的传教士。乾隆下旨：将为英使团做翻译的传教士索德超、安国宁与贺清泰都加升品级，体现了乾隆对这次英使入华的重视。索德超，葡萄牙人，前耶稣会传教士。1759年到达北京，供职于钦天监，曾担任监正。他是一位药师和药剂师。著名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于1774年写道：“一个外科医生通过行医为我圣教争取到的保护者比其他所有传教士把所有智能加在一起所能争取到的还多。”<sup>④5 P125 ~ P129</sup>如在康熙时期，法国传教士张诚与洪若翰就是因为及时向患病的康熙提供了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的疟疾，从而赢得康熙的信任，促成法国在华传教区的成立。索德超就是凭借他的医术进入清廷，得到其信任。

在关于马夏尔尼使华的清宫档案里，我们可以多次看到索德超的名字。他是清廷任命的主要翻译。如“军机处档案之上谕档，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奏为颁给英国王敕谕译文已交索德超等阅过无误事。”<sup>④6 上谕档199</sup>“军机处档案之上谕档，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奏为英贡使所递西洋字禀已交索德超译出呈览。”<sup>④6 上谕档261</sup>“军机处档案之随手档，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奏为遵旨将松筠送到英贡使所递字禀交索德超译汉进呈片。”<sup>④6 随手档513</sup>

#### 二、英使团与在京的天主教传教士

英使团在北京期间，在京的传教士纷纷来拜访。8月23日，钦差大臣徵瑞带领6名传教士来见英使团。这6人分别是：索德超、安国宁、贺清泰、潘廷璋、巴茂正、德天赐。其中索德超、安国宁是葡籍，贺清泰、巴茂正为法籍，潘廷璋、德天赐为意大利籍。以后又有

法籍传教士罗广祥和钱德明。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却存在着国别、教派等不同的利益矛盾。“他们各从本国的天主教会按时得到一些微小的津贴。除了宗教活动而外,出于感激和爱国心,他们还充当各自国家在中国的代理人。遇有涉及到本国利益的事项,他们总有些活动。在某些具体教条上,这些传教士之间是有争论和矛盾的,现在某一国家的传教士同其余各国的传教士可能还有对抗;……”<sup>①</sup>

对马戛尔尼访华问题上,传教士之间也存在着两派:以葡籍为主的对英不友好的传教士和以法籍为主的对英友好的传教士。

1.对英国不友好的传教士,他们主要以葡籍索德超为首。他们出于维护本国在华优势的心理出发,担心强大的英国加深对华关系,将威胁到他们国家在华利益,因而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外交活动进行破坏和阻挠。

英使团入华后,就不断从法国和意大利传教士那里听到关于葡籍传教士将不利于英使团的情况。马戛尔尼未见索德超等之前,已经对其存有恶感。与索德超的第一面,加深了马戛尔尼对索德超的恶劣印象。“(索德超)……然妒念极重,凡西人东来者,除其本国入外,罔不加以仇视。对于英国人怀恨尤切。吾至澳门之时,即有人嘱余抵北京后善防此人。今日一与此人相见,观其沉毅阴险之貌,始知此人非处处防范,必为所陷。”<sup>②</sup>

而索德超也确对英使团没有好感。在第一次会面时,作为清政府派去的首席翻译,他误以为英使不懂拉丁文,频繁用拉丁文与身旁的意大利传教士论及英人短处,结果却被懂拉丁文的马戛尔尼尽数听到。这令马戛尔尼大为不快。当马戛尔尼提出在去热河前,英使团先移居北京城。索德超趁机阻挠,他的行为甚至令其他传教士都感到吃惊。马戛尔尼拒绝索德超担任使团在京的翻译,清廷接受了英使团的选择,让德天赐神父担任在京翻译,但当英使团到热河后,索德超又被清廷任命为翻译。据记载,在马戛尔尼第一次觐见乾隆时,在旁边的翻译即是索德超。“英吉利国贡使到时,……卯初请皇上御袍褂升宝座御前,……臣和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副索德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递表文。”<sup>③</sup>

其他两位葡籍神父也都参与了破坏英使

访华之事。阿布雷沃称:“马戛尔尼勋爵出使期间,宫廷内的葡萄牙神父们直接破坏了英国的利益,蓄意挑起恐慌,宣扬英国已在世界各地吞并许多地方,也有可能吞并中国的领土。”<sup>④</sup>关于此,我没有看到具体的中文资料。但明确的一点是,在1802年“告发英国人侵袭澳门”时,正是汤士选和索德超一道给清朝官员上奏。在即将离开中国时,马戛尔尼确信:“葡萄牙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体制,使其他国家憎恶并被排斥在中国大门之外。”<sup>⑤</sup>

2.对英国友好的传教士,以法国和意大利传教士为主。他们为英国使团做了许多有利事情,向使团提供关于清廷的情报,提出有益的建议,帮助马戛尔尼改善与清廷和清官员的关系。

最积极帮助英使团的传教士当属法国人格拉蒙特。他积极为英使提供消息,先后给马戛尔尼五封信,提供许多情报:如关于清廷对英使的态度、人事安排;又开列一批可能影响乾隆对英态度的权臣和贵戚名单,建议使团加以贿赂,从而达到谈判目的。马戛尔尼采纳这个建议,专门采购价值2399英镑的礼品,按照格拉蒙特所开列的名单进行选送。他曾为使团找到一个中国教徒为英使翻译信件。

其次为罗广祥神父。他向英使介绍中国的国情,以及关于清宫和朝廷的内幕。了解这些情况,对马戛尔尼展开与清朝廷的谈判有利。在马戛尔尼离京后,他又和贺清泰一起翻译了乾隆给英王的第二封敕书。

还有一位安育德神父。他建议,让英国国王和清朝皇帝通信,让在广州的英商派一名人员与两广总督联络感情。马戛尔尼对他的建议非常赞赏,回国后,促使英王给乾隆表示感谢和愿意继续友好的信件。当嘉庆皇帝登基时,英国人也派人送来礼物,表示尊敬和祝贺。

再有德天赐等传教士,被清政府派去圆明园,向英国科学家学习机械的安装,同时兼任翻译。

3.造成在京传教士对英使不同态度的原因。“在总的利益上,在东方和西方风俗习惯差别上,他们(指传教士)又结合起来。在这个远方国家里,每一个欧洲人都被认为是本国人,都得到照顾。”<sup>⑥</sup>那么因何葡萄牙籍

传教士要如此积极地破坏马戛尔尼使团的外交活动呢?

首先是英葡矛盾。这主要由于英国与葡萄牙在澳门和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引起的。英商与澳葡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从第一艘来华英船开始,东印度公司就非常渴望在中国得到一个立足点,以直接从事贸易。澳门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有利地位,使英人对澳门有了极大的兴趣。马士在《东印度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多次提到英人有“购买澳门”的想法,1787年,卡思卡特写给邓达斯的信中认为英国从葡人手中割让过去是可能的。<sup>[8] P157)</sup>而这次马戛尔尼使华,邓达斯的训令中的一条就是,希望英商能够像葡商那样,在中国有一个便利的“商站”。爱国的葡籍传教士为了维护本国在华利益,必然尽力阻挠英国使团。据记载,索德超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曾经通过自己的力量,影响清廷,帮助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其次是传教士之间的矛盾。这主要包括传教士不同国别引起的矛盾和传教士个人之间的矛盾。先是不同国别引起的传教士矛盾。16~18世纪葡籍传教士,借葡国在东方的“保教权”,一直是在华的一支重要的传教力量。但到17世纪末,葡萄牙在华的保教权遭到了法国的挑战。1700年,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区正式得到了教廷认可,打破以往仅有一个葡萄牙传教区的局面。两国在华的保教权之争,引发了两国传教士之间的摩擦。葡萄牙利用其对澳门的控制,经常刁难法国传教士。他们截留法国寄给其传教士的书和经费,以致法籍传教士穷困不堪。

这种由国别引起的传教士之间的矛盾,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加深。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它在东方的传教活动被法国遣使会接手。这对于葡萄牙教会在东方的影响力必然是一个打击。当英使团入华后,一向与英商关系良好的法籍传教士采取了欢迎态度,而与英商及法籍传教士有矛盾的葡籍传教士则消极迎接或阻挠英使。

再者是传教士个人之间的矛盾。格拉蒙特对索德超的敌视。在所有在京传教士中,他最直接将矛头对准索德超,也是他最早通过密信告诉马戛尔尼:索德超将破坏英使团的活动,而在英使离京后,他又将英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索德超的破坏。在清廷的几

乎所有正式档案和文件中,都没有找到格拉蒙特的名字,而索德超却屡屡出现。很有可能格拉蒙特为此嫉妒索德超。正如佩雷菲特所言:“传教士们完全是仰仗皇帝每天的恩准才能在中国生活的。”索德超在清宫廷的“高升”确有可能引起其他传教士的嫉妒之心。

## 结论

### 一、马戛尔尼使华失败与传教士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华传教士对于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应负很大责任。在英使团回到英国后,几位使团成员先后出版了有关这次出使的书籍。他们认为是索德超和其他葡籍传教士的阴谋破坏,导致马戛尔尼出使失败。格拉蒙特认为,使团没有带上了解中国国情的传教士,是此次出使失败的重要原因;又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依我来看,主要是传教士索德超在背后搞阴谋,从中作梗。由于听说英国使团要影响他国的商业,因此传教士就散播了一些对英国不好的言论。”<sup>[8] P278)</sup>

第二种观点,马戛尔尼访华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乾隆时代所奉行的相对稳定的对外“限关自守”或者说是“闭关自守”政策。

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18世纪的清朝,虽然其国力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但同时他的保守性也达到一个顶点。从马戛尔尼使华的过程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以乾隆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层,对于外界事务的麻木、无知和自大。自然经济占主体的清代社会,不可能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英国建立一种平等贸易机制。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发展有许多偶然性因素的存在,这些偶然性因素不会改变大的历史进程,但是将会影响历史的局部发展。将马戛尔尼的失败仅生硬地全部归结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不够具体和全面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局部和具体因素对这次出使的影响。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就是马戛尔尼使华中,我们不可忽视的具体因素。

首先,我们看天主教传教士在清廷供职的唯一机构——钦天监。自康熙朝汤若望就职钦天监以来,钦天监就成为欧洲传教士在华的一个中心。在清廷心目中,钦天监也是料理全部西洋人的一个机构。《清会典事例》:“乾隆二十四年复准:西洋人寄住澳门,遇有公务转达钦天监,令夷目明呈海防同知,

转详督臣,分别咨奏。”据《清文献通考》记载,自1753年(乾隆十八年)葡籍会士傅作霖任钦天监监副,葡人在钦天监的势力逐渐加强;自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监中任职的会士全为葡籍,直到1826年(道光六年)三位西洋监正、监副同时去世,钦天监不再用外国人。从钦天监的任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葡籍传教士在清廷具有的势力。

这次清廷派去负责接待英使团的传教士中,虽然葡法人数相当,但是担任翻译首领的是葡籍传教士索德超;虽然都晋升了官职,但是葡籍传教士索德超和安国宁是三品顶戴,而法籍传教士贺清泰只是六品顶戴。而一直很积极帮助英使的法国传教士格拉蒙特,甚至没有进入清廷的视野。因此他顶多只能给马戛尔尼提出一些建议,却不能利用他在北京的影响,真正帮助英使团。

其次,传教士个人的影响力。对英使团怀有敌意的葡籍传教士索德超,在马戛尔尼使华期间,是钦天监监副。不但可以凭借其在“公务”上为难英使,还可以利用他在清廷的力量,破坏英使与清廷的谈判。

索德超在当时所有在京传教士中,他在京时间最长,了解中清宫廷、君主和大臣,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维护葡萄牙传教士和本国在华利益。就在英使入华的3个月前,索德超给和珅治疗多年的腿病,效果良好,因而赢得和珅信任。清宫档案记载,正是和珅推荐索德超担任使团翻译。

乾隆朝末年,和珅“宠任冠朝列”,能够影响乾隆的一些重要决策。马戛尔尼来华,其主要谈判对手正是和珅,而和珅却没给英使“谈判”机会。马戛尔尼几次与和珅的对话都未进入“正题”。与遭到“冷落”的马戛尔尼不同,索德超正“春风得意”。他由和珅带领参加了英使初次觐见乾隆的隆重仪式。在众多的清宫档案里,多次提到由索德超阅看过某翻译文呈上。

当两个互相不了解的人初次见面时,一个第三者的话往往起重要作用;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国家之间。中英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双方甚至都没有自己国家的翻译做媒介。他们依靠讲拉丁文的第三国家的传教士,彼此很难真正了解对方。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英第一次交往中,传教士所起的破坏作用大

于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

## 二、从马戛尔尼使华一案看传教士在清前期中西外交活动中的作用

正如斯当东所说:“在过去几次外国使节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个被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传教士常常被派出去迎接使节并陪同一道晋京。”据《清会典事例》记,在1727年(雍正五年)葡萄牙使团入华时,遣内务府郎中一人,同在京居住西洋一人,往迎来使。1753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巴哲格使团入华时,乾隆下令:礼部堂官一人,率领在京居住西洋人一人,引来使进见进表,仪与雍正五年同。可见由传教士往迎入华的欧洲使节,在清廷已经成为惯例。

每由欧洲国家使节入华,传教士就会被清廷委派负责接应和照料;同时使节也被安排在居住在教堂内。尽管英国是新教国家,但清廷仍旧安排英使团居住在天主教堂内。在当时清心目中,这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都是为一体的。而传教士们同为欧洲人;在某些具体教条上,这些传教士之间是有争论和矛盾的。现在某一国家的传教士同其余各国的传教士可能还有对抗,但在总的利益上,在东方和西方风俗习惯差别上,他们又结合起来。在这个远方国家里,每一个欧洲人都被认为是本国人,都得到照顾。”因此有时不一定是哪个国家的使团一定由哪个国家的传教士为之服务;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在接应过程中,传教士是否付出全部努力,帮助这些对中国一无所知、肩负使命的使节了解中国、学会应付中国官吏,从而最大程度上方便他们的出使。

得益于与传教士友好的关系,葡国的两个使团:1727年(雍正五年)葡葡麦德乐使团和1753年(乾隆十八年)巴哲格使团,都得到了清廷比较友好的接待。而荷兰使团却没有葡萄牙人的便利条件。顺治时期,荷兰使节访华,传教士就曾经利用在顺治身边的机会,加以破坏。南怀仁在管理中国的耶稣会时,认为葡萄牙对耶稣会和基督教事业有很大功绩,因此所有传教士似乎都应对葡萄牙的利益采取同情态度。荷兰人为了打破葡萄牙对华贸易的垄断,两次派遣使节入华,由于传教士的阻挠,都未能如愿。欧洲使节入华,由传教士陪伴,既是翻译,也是促进双方了解的媒介。传教士参与清廷外交,最积极的例子便

是传教士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

综上,传教士在清前期中西外交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是翻译的作用。以马戛尔尼出使为例,由于清廷不允许中国人学习外语,也不允许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所以当英使团准备时,语言问题成了一个大难题,随行的华籍传教士又不懂英语。拉丁语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通用语言,也是教士必修的语言;而在北京的传教士既懂拉丁语,又懂汉语,正好可以作为中英双方的媒介。乾隆给英使的两道敕谕都是由传教士译成拉丁文转交给英使,而英使的照会也是请传教士先译成拉丁语,再译成汉语交给清廷。

其次是沟通作用。中西之间距离遥远,长期隔阂。明清之际,传教士入华,带来了西

方的文化,同时将东方文化传播到欧洲,加深了中西方的相互了解。欧洲国家出于经济的、商业之目的,派遣使节入华。在京传教士受清廷委托负责迎送,向使节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地理,便于双方的沟通。外交活动是一个双向的活动,当双方彼此陌生时,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存在。清前期传教士在中西外交活动中,正是起到了第三方的作用。我们应当积极肯定传教士在中西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传教士作为宗教神职人员,有他们所属的宗教派别和国家,有他们本身的宗教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不可能处在完全公正的位置上。他们有时帮助欧洲来华使节,有时又采取各种方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 参考文献

- [1] 斯当东.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 [2]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 [3] 朱杰勤. 中外关系史译丛[M]. 青岛:海洋出版社,1984.
- [4] 阿伟亚.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5] 阿布雷沃. 北京主教汤士选与马戛尔尼勋爵使华[J]. 澳门文化署文化杂志,1997(32).
-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6.
- [7] 濮兰德·白克好司. 乾隆英使觐见记[M].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
- [8] 朱雍. 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李鲁祥]

## Catholic Missionaries and Missions Ma Lance President

YUAN Mo-xiang

(Zaozhuang University Law and History, Zaozhuang 277160, China)

**Abstract** 1793 led by the Lord of Raymond Ma Ga lance British missions in the name of mission to the Qing Dynasty Qianlong emperor birthday. It is the first official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study the mission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or commercial perspective,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itish cultural differences, 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develops one's own style, attempts from to be the third party—missionary's angle discussion, causes in the Chinese process in the Lord of Ma Ga lance president of China process, the missionary ar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Sino-British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xchanges, or damaged both sides of the first contact, resulting in the Sino-British diplomatic activities first failure?

**Key words** missionary the Lord of Raymond Ma Ga the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 天主教传教士与马戛尔尼使团

作者: [袁墨香, YUAN Mo-xiang](#)  
作者单位: [枣庄学院, 政法与历史学系, 山东, 枣庄, 277160](#)  
刊名: [枣庄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ZAOZHANG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6, 23(1)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8条)

1. [斯当东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1997
2.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991
3. [朱杰勤 中外关系史译丛](#) 1984
4. [何伟亚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2002
5. [阿布雷沃 北京主教汤士选与马戛尔尼勋爵使华](#) 1997(32)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1996
7. [濮兰德·白克好司 乾隆英使觐见记](#) 1995
8. [朱雍 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 1989

## 相似文献(2条)

### 1. 学位论文 [袁墨香 马戛尔尼使华与天主教传教士](#) 2005

1793年, 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 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出使清朝。这是中英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国家间交往。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让英国急于向外扩张, 寻求倾销市场。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中国; 由于当时的清廷国势正盛, 英政府不可能采取武力措施打开中国市场; 因而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访华, 希望同清廷谈判, 改善两国贸易存在的问题, 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从16世纪开始, 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东来。在以后的大约200年间, 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风俗、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学传入中国, 促成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繁荣阶段。这些传教士成为最早的“汉学家”, 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的西方人。

葡、西、荷等西方国家逐渐与明清政府发生接触。他们多次组织商团或使团来华。作为了解东方的西方人, 传教士就成为中西交往的媒介。他们不仅作为双方的翻译, 也是西方使者入华的“引路人”。

马戛尔尼使华不可避免的与这些在华的传教士发生联系和接触。那么这些传教士在第一次英使入华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是仅仅作为中英双方的语言翻译而存在的?还是起到了更多的影响?本论文正是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探讨。

文章凡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导论, 主要总结了以往学者对马戛尔尼使华问题的研究。指出一些学者从清朝角度出发, 认为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是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 另有一些学者从礼仪、文化、贸易等角度出发, 研究马戛尔尼的出使。多数学者将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中英双方。很少提及第三方在这次出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因此本文就此提出问题: 传教士在马戛尔尼的出使中究竟是起到了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是叙述和分析马戛尔尼出使前的准备工作与传教士的关系。首先是分析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华的背景与目的, 指出中英贸易的发展演变和英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马戛尔尼使华的背景; 而通过外交途径, 来改善中英贸易的状况和在华的英商的待遇, 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就是此次出使的目的。接着论述马戛尔尼的出使准备工作, 尤其是详细论述使团需要翻译和媒介, 传教士正是充当了这个角色, 突出分析使团在英国并未找到合适的翻译, 在欧洲找到的传教士翻译并不能完全胜任。再次分析天主教传教士在乾隆朝的状况, 指出传教士已经不能像康熙朝那样备受信任, 由“帝师”降到“陪臣”和“工匠”。

第三部分主要是讲述马戛尔尼使团与在京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关系。首先是介绍在马戛尔尼使团入京前, 与在华传教士的接触; 其次是从两个方面分析马戛尔尼使团与在华传教士: 对英使不友好的传教士(以葡籍传教士为主)和对英友好的传教士(以法国籍传教士为主); 然后分析造成传教士对英使团不同态度的原因是英葡矛盾和传教士个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分析了乾隆给英王的第二道敕书中的关于传教的问题, 重点分析传教士是否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首先分析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与传教士的关系, 先分析了对此问题的两种观点, 再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同时, 必须看到偶然性的存在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葡籍传教士在清廷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他们通过和碑等清朝重臣直接影响了马戛尔尼的出使。

最后从马戛尔尼使华的个案, 察看传教士在清前期的中西外交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传教士是当时唯一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宫廷的西方人, 对中国最为了解, 成为当时中西交往的媒介。因此在中西最初的外交活动中, 他们也确实发挥了沟通双方的作用, 成为西方使团入华的“引路人”。

### 2. 学位论文 [张雅婧 形式与本质: 康乾时期中西礼仪之争中的文化冲突与权势较量](#) 2009

本文对康乾时期中西礼仪之争中的文化冲突与权势较量进行了分析。18世纪, 欧洲社会在经济及文化领域已然发生了巨变。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之中, 清朝统治者不断加强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西方使团纷纷来华以谋求商贸特权, 除英国以外基本都进行了“三跪九叩”的觐见礼仪。天主教传教士从明朝中期就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利玛窦规矩”成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基本方式。中国礼仪之争的焦点是对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性质的界定。利玛窦把中国的祭祖祀孔礼仪解释为世俗性的。这种解释的权宜性引发了耶稣会内部及耶稣会与天主教其它修会之间关于“中国礼仪”的争执。此时西方教廷对“中国礼仪”持谨慎态度。但当康熙帝在1700年以赞成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介入礼仪之争后, 礼仪之争开始变成罗马天主教神权与中国君权之间的政治交锋。罗马教廷于1704年发布禁绝中国礼仪的教谕, 并派遣铎罗主教来华传达教谕及将中国教区直接收归教廷管辖。1706年12月17日, 康熙帝下达了驱逐令和领票令。至此中西礼仪之争完全演变成罗马天主教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对中国天主教控制权的争夺。当教廷使节嘉乐来华(于1720年11月27日抵京), 重申其前述两点要求时; 康熙皇帝采取强硬态度和措施, 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西方有“政教分离”的思想而中国则相反, 故而此次中西“礼仪之争”的本质是天主教神权和中国君权之间的权力争夺战。

<br>

本文指出, 马戛尔尼使华时拒行“三跪九叩”之礼, 引发了中英“觐见礼仪之争”。“觐见礼仪之争”的背后是中英“外交观念”的不同。盛清时期的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 只存在朝贡制度一种模式。故而清王朝必然会主观地把英国归入朝贡体系之中。而英国则有“平等外交”观念

，并在使华时处处强调这种观念。中英“觐见礼仪之争”的本质是中国和英国如何建构彼此的关系，即双方是按照朝贡体系的尊卑原则来建构中英之间的关系，还是按照西方的“平等外交”来相互交往。同时英国使团的商业使命与中国既定贸易秩序之间的矛盾，亦是当时中英之间的重要冲突。就“礼仪之争”对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来说，西方对中国“礼制”的冲击会动摇中国原有的政治秩序。并且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并未给中国带来近代化的主要元素。更有甚者，礼仪之争后西方对华印象的逐渐改变为其发动对华战争提供了借口。清朝统治者在处理中西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西方势力的威胁，故而对其严加防范；这正是其维护统治的需求，而不是“保守自大”的表现。实际上，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了双方在礼仪风俗上的不同，即便是西方人对礼仪之争亦有不同的理解。那么造成中西冲突的根源就不仅仅是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仅仅是权利争夺的屏障和借口。故此，“礼仪之争”所产生的后果及其责任似不应简单归咎于清朝统治者。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zsfzkxxxb200601023.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zsfzkxxxb200601023.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741f12a5-0544-4d43-91a5-9e4d0073820b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